

苏联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 徐浩然

作为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很落后。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的基本面开始恢复。斯大林认为发展重工业才能增强苏联经济的独立自主地位，摆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束缚，用最新式的机器和最新科学技术支援农业。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形成了。

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苏联的计划，最初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地方提出的计划加以协调平衡制定出来的。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计划制定的程序出现调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要以过去几年经济发展趋势的外推法来制定有关计划的数量和质量框架，然后下达指令性指示；据此，各级人民委员会和各经济区的计划委员会准备自己部门和地区的初步草案。最后，中央在统一的国家计划的框架内平衡各地的方案。

1925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方针：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附庸，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经济单位。但并不是说，轰轰烈烈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就此开始了，因为工业化不是十四大讨论的重点，苏联此时还没有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纲领和具体任务。

苏联制定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进行了好几年，从1925年开始到1929年完成，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这项工作，经历了3个关键性步骤：一是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二是1929年4月，全苏第十六次党代会对五年计划草案进行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三是1929年5月，全苏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之具有法律效力。

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的国家工业化是具备一定基础的。1926年苏联基本完成国民经济



20世纪20年代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车间

恢复，然后迅速增加了对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1924—1925年度对国营工业的投资为4299亿卢布，1927—1928年度投资达到14674亿卢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新建大型工业项目和改造扩建旧企业。从1927年10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前，苏联有近千个新建企业投产。1925年苏联工业还没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而到了1926年，工业总产值一年之间迅速增长43.2%。重大项目建设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入与实效

苏联的“一五”计划是一项宏伟的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是要解决工业化建设中的人才和技术问题，否则“一五”计划根本无法落实。在苏联国民经济结构中，大工业比重很小，工业技术人才紧缺，工农业发展需要的设备大都需要进口。新企业需要新设备，原有企业设备磨损老化亟待更新，技术落后和设备匮乏是国家工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当时正值苏联“一五”计划的关键时期。西方国家为了缓解自身危机开始扩大出口，由此放松了对苏联的经济封锁。斯大林利用西方资本家迫切向国外输出商品、寻求销售市场的需求，大量引进外国设备与技术。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器设备购买者，1931年，

苏联购买了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左右，从1926年至1931年，苏联的进口额增加了5倍，其中重工业设备增加了11倍。在进口额中，90%左右是机器设备的进口。

苏联在实施“一五”计划期间，建立了拖拉机、汽车、航空、化工和机床制造等新工业部门，建设了一批大型机器制造工厂、冶金工厂和发电站，如哈尔科夫、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库兹涅茨钢铁联合企业，第聂伯河水电站等，这些基础工业建设为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苏联还积极引进西方专家对企业的建设和组织提供指导。比如，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最大项目“马钢”，直接参与该厂建设的美国人有250名；约有80家美国厂商为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制造设备，参加该厂组装的美国达人570名之多，另外还有50名德国人。

苏联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大力推进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在文化建设方面投入了239亿卢布，占国家全部预算开支的19.9%，相当于工业拨款的一半以上。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该项投资已达1078亿卢布，1937年时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重提高到了29.1%，已经超过了工业的预算拨款额754亿。教育方面的投入显示出苏联对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苏联形成了从小学到高等院校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到1939年初，9岁以上人口识字率达到了81.2%，这在当时世界上也

是比较高的水平。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突出特点是重工业高速发展，尤其是第一部类（生产资料）发展迅速。计划规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直属工业的总产量按最佳方案应在5年中增长1.8倍，其中第一部类增长2.3倍，第二部类增长1.4倍。这就决定了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很高的水平。计划规定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为19%—20%，官方宣布的数据为22%，而实际为19.2%。

苏联工业的飞速发展同当时处于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生产停滞甚至下降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比如在1929—1932年间，美国工业下降了42%，英国下降了12%，德国下降了39%，法国下降了24%，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33%。这一时期，苏联的工业发展速度不仅高于危机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远高于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化发展最快时期的速度。例如，1880—1885年美国工业发展率为8.5%，德国1855—1923年为5%，西欧1870—1900年为3.7%，日本1907—1913年为8.6%。再如，沙俄时期1895—1900年为9.2%，1900—1910年为3.2%，1910—1913年为6.0%。可以看出，在工业化时期，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达到10%的增长率，而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增长率将近20%。

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9个月完成。苏联充分利用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大规模贸易，在这期间人民群众以极高的劳动热情从事基础工业建设，一大批重点项目为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斯大林说，“这一切就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国。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形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值跃居欧洲首位、世界第二位。苏联完成国家工业化，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人民群众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上接1版二条）毛泽东指出，“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显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劳模精神最早就是在苏区生产竞赛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随着劳动竞赛的不断发展，升华发展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内涵。要将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同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推动竞赛的蓬勃发展，把广大职工广泛吸引到竞赛中来，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上大胆突破创新，为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献计出力。

在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思想政治引领是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首要任务。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目标就是要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产业工人队伍，充分体现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对职业价值、职业操守、职业精神的追求。在推进这项改革中，要突出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引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以职业道德为重点的“四德”教育，深化“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宣传教育，组织广大职工深入学习劳动模范和先进模范人物，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用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

在提升职工技术技能素质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劳模精神强调争创一流、勇于创新，通过思维、知识、技术等创新，敢为人先、突破常规，创造新的生产条件、方式和成果，这是劳模精神的核心要素，也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方面。工匠精神强调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要求在既有成绩基础上始终严格要求，不断提升技艺、产品、质量，进而达到超凡出众水平，这是品质层面的要求，是工匠精神的内核，也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要求。要将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与提升职工素质紧密结合起来，把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深入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引导广大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提供强大人力支撑和智力保证。

“文化使者”袁晋卿。如果就东渡日本的人物而言，袁晋卿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力可以说仅次于鉴真。公元734年，以多治比广成为首的日本遣唐使团基本上完成了朝贡和其他外交任务。当时正值唐玄宗开元盛世，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所获得的中国文化，已无法满足日本的需要，因此，招请唐人赴日，成为日本吸收、移植唐朝先进文化的重要选择。

此时，年仅十七八岁的袁晋卿，被日本人选中了。袁晋卿熟习《文选》《尔雅》等典籍，尤其擅长音韵学，具有较高的语音才能。隋朝以前，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南朝文化，汉语的读音基本上采用江南地区的语音，一般称为“吴音”。隋朝建立以后，日本在输入文化方面从江南转向北方，开始学习、使用“唐音”。正是在日本由吴音向唐音转换的时代背景下，袁晋卿受在唐留学17载的吉备真备等人邀请，作为护送使，随以多治比广成为首的遣唐使团赴日。

袁晋卿到日本后，与阿倍仲麻吕以日人而仕于唐相对应，他以唐人而仕于日，成为一位传播大唐文化的杰出使者。袁晋卿作为一位学者型官员，在日本经历了50余载的仕宦生涯。他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工作，担任过大学音博士和最高教职大学头，“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口吐唐言，发挥婴学之耳目”，对吴音向唐音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担任过主管接待外国使臣及佛寺僧尼等事务的玄蕃头，并依靠自己的才华和出色的工作，被天皇赐姓“清村宿祢”；担任过日向国和安房国的国司，成为唯一一位担任地方最高长官的渡日唐人。

袁晋卿在日本娶妻生子，共育九子一女。在日本真言宗创始人空海的文集《遍照发挥性灵集》里，有一则题为《为藤真川举净丰启》的文章，记述了袁晋卿家族的活动事迹及其际遇。袁晋卿之子弘、秀二人曾在中央和地方任官，但都英年早逝。袁晋卿第九子便是空海为之作启的净丰。净丰继承家学，曾任日本名门贵族藤原氏的教师，后任桓武天皇的皇子伊予亲王的教师，继续为中日文化交流作贡献。

“以身殉职”赵宝英。公元777年，日本派遣了以小野石根为首的遣唐使团。当遣唐使团一行准备启程回国时，唐代宗下令以宦官赵宝英为大使，陪送日本遣唐使回访日本。小野石根似乎预感到归途不顺，推辞说：“本国行路遥远，风漂无准。今中使云往，冒涉波涛，万一颠覆，恐乖王命。”但唐代宗酬答的意思十分坚定，认为这是“道义所在，不以为劳”，坚持要让赵宝英陪同遣唐使前往日本。

次年6月，赵宝英一行随遣唐使团一同来到扬州。由于代宗下令建造的船只未能如期竣工，赵宝英在取得代宗的允许后，随同小野石根乘坐遣唐使第一船赴

出访日本的唐朝使节

□ 章林

日。第一船乘员共有160多人，包括判官大伴继人等人。前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在唐朝结婚所生的女儿喜娘也在这艘船上。除了第一船之外，遣唐使团另有三艘船。

赵宝英所乘第一船在航行到东海中间位置时遭遇了大风暴，很多人遇难。大伴继人幸免于难，后来，他就这次海上遇难事故专门写了一份报告，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次航行的详细情况。“八日初更，风急波高，打破左右棚板，潮水满船，盖板漂流，人物漂溺，无遣勺撮米水。副使小野朝臣石根等卅八人、唐使赵宝英等廿五人，同时没入，不得相救。”“十一日五更，帆船倒于船底，断为两段。舳舻各去，未知所到。四十余人累居方丈之舳，举舳欲没。载缆枕柁（舵），得少浮上，脱却衣裳，裸身悬坐。米水不入口，已经六日。”万幸的是，大伴继人和喜娘等人借助残破的船骸，经历九死一生后漂流到了日本。

赵宝英遭遇海难去世后，唐使判官孙兴进代行其事，继续执行使命。孙兴进等人到达日本后，受到了日本朝廷的热情款待。在古代中外交流史上，赵宝英是见于记载的第一位奉皇帝之命出使远国的宦官，同时也是唐代中日关系史上以身殉职的高级使臣。在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正是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渡日唐人和遣唐使，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两国的相互了解，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

（上接1版头条）

聚焦“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深入推进创新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对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我们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机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开展科技强链行动，集中全区优势创新资源，吸引国内国际专业创新力量，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实施源头创新引领工程，加快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学基础设施、产业创新综合体、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广西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发展，推动自治区实验室建设，推进中国—东盟科技城建设，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布局建设双向离岸创新平台及“创新飞地”，建设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创新中心。坚持“前端聚焦、中间协同、后端转化”，实施一批科技重大专项，打好汽车、机械、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重要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科技创新为产业赋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高标准打造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链，推进实施千企科技创新工程，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和中试基地等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推

动更多新产品新技术产业化。坚持全产业链发展思路，聚焦优势产业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实施产业链基础再造和全产业链提升工程，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强科技政策与产业、财政、金融等政策有机衔接，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快科研院所改革，扩大科研自主权，改进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推行“揭榜制”，建立健全科研成果与企业科技需求对接机制、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来桂转化支持机制、创新成果转化转移收益分配机制，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最大限度调动科技人才创新能动性。弘扬科学精神，在全区营造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

聚焦“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着力扩投资促消费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广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筑牢投资“压舱石”，提升消费“主动力”，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为稳增长促发展提供更强支撑。坚持把产业投资特别是工业投资放在第一位，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聚焦“三大三新”和“两新一重”，深入推进中央企业、民企、湾企“三企入桂”，

建设一批强基础、增功能、优结构、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能力提升、临港产业集聚、“两湾”互联互通、重大能源建设、产业数字化提升、重大科技研发攻关等重大工程，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农田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物流网、地下管网“五网建设”三年大会战。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强化财政和金融统筹协调，深挖投资潜力，优化投资结构。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完善促进消费政策，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加快发展大宗消费、线上消费、健康消费、文化和旅游消费，鼓励发展新消费模式，推动传统商品消费提质升级，充分释放汽车、家电、家装等传统消费潜力，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开拓城乡消费市场，壮大夜间经济，扩大节假日消费，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枢纽，是事关广西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和深刻变革，需要全区上下作出长期而艰辛的努力。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把广西独特的区位优势发挥出来，在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加快建设壮美广西，不断谱写新时代广西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开启新征程中不断拓展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融入精神谱系。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革故鼎新、发明创造，彰显了伟大创造精神；他们辛勤劳作、自强不息，彰显了伟大奋斗精神；他们同心同德、守望相助，彰显了伟大团结精神；他们心怀梦想、不懈追求，彰显了伟大梦想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与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具有同向

推动理论创新。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使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原创性、标识性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拓展，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激发全体人民的信心和热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国家而不懈奋斗。（作者系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副主任）